

當前國民小學社會科 課程、教學及評量的分析與批判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一、認知心理學觀點

首先，假使我們先不去質疑國小社會科的課程內容是什麼，而直接從教與學的關係（參考鄭昭明，1987,1988）去質問：(1)教學者在教學活動進行前，他（她）所擁有之這些學習內容的知識是什麼？有多少？目前又有那些評量辦法、方式與工具來衡量或瞭解教學者知識內容的質與量？(2)不同的學習者擁有這些學習內容的知識是什麼？有多少？目前又有那些評量辦法、方式與工具來衡量或瞭解學習者知識內容的質與量？(3)教學者唯有在瞭解所欲教學之內容與學習者既有的知識在質與量上的差距之後，才能進一步去思考應該蒐集那些必要的教學材料，應該設計那些合適的教學活動，方能將這些新知識藉著教學媒介傳遞給學習者。然而，目前每個學習單元所分配到的課程時數是否足夠讓教學者去蒐集教材、設計教法，記錄學習者的學習成果？甚且，教師手冊中所提供的各學習單元的教學參考資料是否充份、有用？無不令人懷疑。(4)目前的學習評量表是否具備良好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與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教學者又是否具備各種能力測量與成就測量之使用與編製的能力？

茲以二年級第二學期社會科第二單元「我們生活的地方」為例，該單元的目標有三項：(1)認識學校及住家的環境，(2)養成愛護生活地方的態度，(3)發展維護生活環境的能力。至於在教材網要方面，第一項目標包括所欲認識之環境的範圍、內容與認識的方法，第二項目標包括瞭解環境與生活的關係與喜歡環境中的景（事）物，第三項目標包括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與行動的能力。

雖然教師手冊就每個單元目標再細分出多項的具體目標，並羅列出教學內容要點、教學準備應注意事項，說明各相關的教學活動內容、提示教學資源（如教學演示帶）、教學時間、評量方式，以及開列出相關的參考資料。但是，目前國小二年級社會課每周僅有兩節80分鐘的時間，且通常這兩節課不是安排在同一天連續上課，因此在教學內容的實施上是斷裂的，學生通常不易將兩節課或各周所學習的知識作有意義的聯結。況且，就低年級學生而言，其記憶廣度通常較窄，新學習的知識常僅停留在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知識的遺忘是常有的現象。

再者，以「我們生活的地方」這一單元為例，整個單元必須在九節課教完。換言之，每一具體目標僅有一節40分鐘的時間授課，可預見的時間的不夠使用是

每位老師經常面臨的問題。以該單元具體目標1-4為例，其目標內容是：學生能觀察並記錄生活的環境。以這個目標的廣泛性與豐富性來說，教師能否周詳而清楚的認識與瞭解其中所指的「生活的環境」（至少包括人文及自然環境）可能就是問題，更何況欲在短時間內讓學生充分瞭解、認識、吸收、記憶，顯然甚難達成。此外，假使教師願意利用每天下午的休課時間自修，但以目前國小二年級必須修習國語、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美勞、唱遊等如此多的科目，且每個科目的課程單元如此繁多、繁重的情況下，教師所剩屬於自己能夠充實進修的時間實在十分有限。

再者，目前教師手冊中所提供之各學習單元的教學參考資料，不僅非常不足，且對教學者教學上的實質幫助十分有限。例如，在「我們生活的地方」這一單元中，教師手冊提供了環保漫畫手冊、環境保護進階及環境保護入門等三本書。以這三本書的內容來看，根本無法滿足教師之教學需要。對社會科之教學而言，學校當地之氣候、地理、地質、動植物、歷史、文物、經濟活動、產業結構、人口及族群組成與變遷、及宗教信仰等等自然與人文景觀，皆為教學者在教學活動進行之前，必備的基本知識之一。缺乏這些基本鄉土教材與地區性資料，社會科的教學目標欲想順利完成，根本是緣木求魚。

另就學習的評量來看，教師手冊所提供的學習評量表，不僅失之籠統，且未符合多元評量方式的要求。尤其就社會科知識的性質與形式來看，紙筆、量化的測驗相當不適合作為學習者學習過程與學習表現的衡鑑工具。此外，手冊中學習評量表所列的學期成績，共有該學期所應學習之三個單元的成績總和、總平均及等第三項，可見這中間表明了社會科之學習表現一方面是以量化的成績來表示，二方面是該學生與班上其他同學（或某一常模）比較的結果，而非該學生自身學習前與學習後之表現的比較結果。再者，過去的學習評量過於注重學習結束後之成就，而少重視學習歷程的理解與進展。

最後就低年級所有的課程單元來看，在教學整體架構的連貫上，一年級第一學期的學習單元以學校、家庭為認識的開始，再論及良好的生活習慣應有的內容，二年級第一學期則從認識自己的成長與變化開始，次論及自己與他人的交往關係，再論及自己與團體如何相處與生活，可見在教學概念上是由己身擴展到己身與團體之關係的教育，還算合乎連貫性。二年級第二學期則先討論我們的習俗，次論我們生活的地方，後論為我們服務的人，可見其重點在於我們所生活之土地的風俗習慣、地理、及相關重要人物認識與學習。整體而言，以上三個學習單元在內容上及學習次序的安排上均相當適當。但一年級第二學期三個學習單元之間，則似乎缺乏連貫性與整體性。

再從第一冊至第四冊的學習內容來看，其所反映的觀念、態度與價值，均值得加以分析與批判。周素卿(1993)與吳密察(1993)曾就這四冊社會科教科書的內容進行體檢後指出：

(1) 第一冊部份：

本冊的基本精神在於要求秩序化、管理化，要求兒童一切行動坐臥必須中規中矩；也就是說兒童一進入學校便被要求像個「小大人」。我們很難相信這樣的訓練會使兒童成為「編者的話」所說的「活潑潑潑的兒童」。

我們認為第一冊已經非常明顯地呈現了目前教育的特點：管理化。這樣教育

如何使我們的兒童具有豐富、活潑的創造力？我們認為本學期兒童首次上學，教學的重點應該是家庭至學校的上學路線、上學途中的安全事項等。另外則應該是該兒童認識學校內的設施，並且應該充份誘發兒童面對新環境的好奇心。

(2) 第二冊部份：

遊戲、學習時的規則，安全是很重要。我們也認為這應該是教育的項目，但除此之外便再無它物的課本，讓人直覺這樣的課本根本就是「管理手冊」。

(3) 第三冊部份：

本冊的基本精神仍然在訓練學生如何遵守團體規則，具有很明顯的管理化企圖。教材書中一再出現都市中流的生活形態，顯然不適合非城市的兒童。甚至可能因此造成鄉下兒童的挫折感。

(4) 第四冊部份：

本冊中除了第二單元是我們贊同的之外，第一單元偏重於灌輸傳統倫常觀念，我們以為此無特別強調之必要。第三單元則僅對相當少數勞動者賦予意義，對於其他人的勞動未予重視，甚為不當。第二單元應該改在第一冊的最開頭。

總地來說，

社會科教科書的前六冊（新版），幾乎所有的篇幅都在重覆一個觀念：「秩序」，秩序化學校、秩序化的家庭、秩序化的社會、秩序化的學習。兒童一進入學校，便被下達一個接一個的命令，被教導一個接一個的規則。所以學校有應該遵守的校規、家庭有應該遵守的家規、社會裡有應該遵守的「法律」，除此之外還有傳統道德的倫理，有傳統美德的「忠、孝、節、義」。這些無不都在使人被固著某一個身分（或位置）上，教科書成了寫滿了規則的「管理手冊」或「國民生活須知」。

就教科書來看，上述的這些規則都是工具性的，其目的在使一切有「秩序」。至於這些規則本身的實質內容如何，則是不重要的。所以，即使它是不合情理的封建倫理，也應該被遵守（吳密察，1993）。

二、知識建構論的觀點

仔細審視教師手冊所提供的單元教學活動設計範例，我們實在不易體察出知識建構論的觀點是否具體落實於社會科教學活動之中。再以「我們生活的地方」這一單元為例，其中一項具體目標是期望學生在學習之後能說出學校及住家四周環境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因此，整個教學活動的重點於探討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在具體作法方面，手冊中建議利用：(1)複習：請學生說出學校及住家四周的生活環境內容；(2)討論：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道路」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以藉此評量學生是否明瞭「環境」的概念。在討論過程中，手冊中建議老師以環境中多項內容，如菜市場、廟宇等，代換道路向學生發問，並分別從好、壞兩方面討論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目的在讓兒童瞭解環境與生活的關係。

首先，我們質疑的是：利用複習的方式，請學生說出學校及住家四周的生活環境內容，老師如何可能藉此明瞭兒童之環境的概念？老師究竟應如何去分析學生的回答與反應，從而才能整理出其環境概念？老師又是否具備這種分析問題的能力？再者，由討論的問題來看，老師似乎是在利用引導的方式讓學生主動建構出他自認為的環境與其生活的關係，問題是這整個討論的過程老師應如何安排與

回應？又應如何藉此方式「統整小孩的經驗，讓小孩從實際體驗中，重新審視自己，並具體感受到自身是生活在自然和社會當中」（劉玉燕，1995），從而學生能建構自己與社會、自然的恰當關係，明白如何自處其中，且最終能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知識，瞭解人在世界及宇宙的位置。顯然地，目前國小社會科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活動，是相當缺乏知識建構論的教學取向與基本精神之掌握。

參考文獻

- 吳密察（1993）。社會科—歷史。載於台灣教授協會編，《體檢小學教科書》，頁36-37。
台北市：編者。
- 周素卿（1993）。社會科—地理。載於台灣教授協會編，《體檢小學教科書》，頁28-35。
台北市：編者。
- 劉玉燕（1995）。他山之石：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小學的創造活動課程。人本教育札記
。71，頁28-36。
- 鄭昭明（1987）。認知心理學與教學研究－一般介紹。現代教育，4(6)，頁86- 114。
- 鄭昭明（1989）。認知與語言的基礎研究－教學心理的歷程分析。科學發展月刊，17(1)，頁21-38。

人格

胡適

什麼是人格？人格只是已養成的行為習慣的總和。什麼是信心？信心只是敢於肯定一個不可知的將來的勇氣。在這個時代，新舊勢力，中西思潮，四方八面的交攻，都自然會影響到我們這一輩人的行為習慣，所以我們很難指出某種人格是某一種勢力單獨造成的。但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說：這二三十年中的領袖人才，正因為生活在一個新世界的新潮流裡，他們的人格往往比舊時代的人物更偉大：思想更透闢，知識更豐富，氣象更闊闊，行為更豪放，人格更崇高。試把孫中山來比曾國藩，我們就可以明白這兩個世界的代表人物的不同了。在古典文學的成就上，在世故的磨鍊上，在小心謹慎的行為上，中山先生當然比不上曾文正。然而在見解的大膽，氣象的雄偉，行為的勇敢上，那一位理學名臣就遠不如這一位革命領袖了。照我這十幾年來的觀察，凡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輩中，如高夢旦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吳稚暉先生，如張伯苓先生；朋輩中，如周詒春先生，如姜蔣佐先生；他們的人格的崇高可敬愛，在中國古人中真尋不出相當的倫比。這種人格只有這個新時代才能產生，同時又都是能夠給這個時代增加光耀的。